

刘中国 余俊杰 著



劉錡伯傳



南方出版传媒 广州出版

刘铸伯传

刘中国 余俊杰 著

SPM

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刘铸伯传 / 刘中国, 余俊杰著. -- 广州 : 花城出版社, 2017. 1

ISBN 978-7-5360-8188-8

I. ①刘… II. ①刘… ②余… III. ①刘铸伯 (1870-1926) — 传记 IV. ①K828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025103号

出 版 人: 詹秀敏

责任编辑: 李 谓

技术编辑: 薛伟民 林佳莹

封面设计: 刘绮琪

书名题字: 苏 炜

书 名	刘铸伯传 LIU ZHU BO ZHUAN
出版发行	花城出版社 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(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23号)
开 本	787毫米×1092毫米 16开
印 张	28.75 1插页
字 数	650,000字
版 次	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
定 价	58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-37604658 37602954

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序 一

黄树森

20世纪80年代，有学者质疑：深圳文化到底有没有“老爸”？对它的文化有无，历来啧有烦言。那么，是在奉行一种“弑父文化”，把“老爸”杀掉了？是出生时家境贫穷，被“老爸”遗弃了？还是后辈不争气、不长进，找不到“老爸”了？

刘中国积二十多年极为艰难困苦的劳作，为深圳文化找到了几个“老爸”，且是相当显赫、颜值素质俱佳的“老爸”。

“大鹏所城”，是一个；孙中山三洲田庚子首义，是一个；李朗圣山，是一个；“白石龙大营救”，算是一个。刘铸伯的著作《社会主义平议》（1919年香港出版的），隐藏得很深，这一回，给善于挖掘“文墓”的刘中国捋出来了，也算是这些年来，深圳近代思想史、文化史、学术史研究领域的一个发现吧。

从茅洲河挖淤泥说起

“文革”期间，平头百姓想购买广九线车票，很难。即便凭“革委会”证明侥幸购到票，一旦被检票员发现没有随身携带“边防证”，他们必须在东莞天堂围火车站下车。天堂围下一站是平湖火车站，已经是“边防区”。平湖以南，则是戒备更加森严的边防重地深圳镇，当时号称“南天门”。

1973年，我走出粤北花坪干校的“牛棚”，专案组都作“鸟兽散”，我还傻傻地在那儿等着“结论”，同室难友启发我：审查你的人都溜回广州了，你个被审查的还待在这干吗？我遂回到广州，也算是自己“解放”自己，有了出门排队买菜的“自由”。

历史的荒唐翻过一页不久，我又奉命与一大帮“解放”不久的“牛鬼蛇神”结伴，到宝安县茅洲河挖淤泥。这条河发源于羊台山北麓，流经石岩、公明、光明华侨农场、松岗和沙井等地，然后在沙井民主村流入珠江口伶仃洋。当时，与陈残云、周钢鸣、秦牧、秦粤生、李门诸前辈“同吃同住同劳动”，听他们私下里压低嗓子讲谈香港的高楼

大厦、灯红酒绿以及各种美食。阴天不出工，爬到山顶上远眺香港，远眺伶仃洋。有次周钢鸣讲：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，香港沦陷了，1942年春天，自己和茅盾、邹韬奋、杨刚等被组织上营救到了宝安县白石龙，后来撤退到桂林，先是由游击队护送翻越广九铁路，在平湖一个叫木古的村子里住了一宿……周钢鸣说这话时我走了神儿：因为那时我六七岁了，背着一根“猪肠子”一样的袋子（装着金银细软，那时候土匪不绑架小孩子），跟着爸爸妈妈正在湘桂黔铁路线上逃难“躲日本”。逃难是1938年从武昌徐家棚火车站开始的，一直逃到今天隶属于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独山县。

“文革”结束后，1979年宝安撤县设市，很多人把“深圳”读成“深川”。其实此地无崇山峻岭、长河大川。“圳”也者，小沟是也，一条条流进太平洋。但是，这几十年里眼见到那么多人，在小沟里湿了脚、落了水、翻了船，死鱼一般白花花地陆陆续续漂上来，令人浩叹！他们当初哪一个不是豪气干云，唾沫横飞？被“双规”后或许会念叨起他奶奶昔年教唱的民谣：“小老鼠，上灯台。偷油吃，下不来。喵喵喵，抱猫来，叽里咕噜滚下来。”

深圳市成立后，时任副书记的黄施民老前辈有意调我过去“帮闲”。囿于种种原因，我未能应允，但一直关注深圳的各项改革与文化建设。特区成立初期杂音不断，我为《特区文学》创刊号写的一篇文章发表于1982年7月7日《南方日报》上，不外是为深圳的改革者呐喊助威。后来听说，这篇文章还在深圳市委常委会上被人朗读过。深圳当时历经超极限的心理弹压，急需哪怕片言只语的精神支持和客观评判，由此可见一斑。

“一夜城”拔地而起初期，我常常坐着“灰狗”大巴到特区，看香港电视，领略现代文明，也大包小包地购买嘉顿饼干、玻璃丝袜、太空楼，有许许多多的兴发感怀。近些年与深圳学人梳理深圳城市发展史，亦有诸多拍案而起的惊艳与慨叹，我和于爱成、夏和顺、刘中国联手编撰《深圳九章——开放史记 改革通鉴》（花城出版社，2008年）出版后，深圳有关部门为此举办了“深圳经与中国梦：《深圳九章》首发暨学术研讨会”，邀请京、津、沪、穗与港澳专家学者以及省、市宣传文化部门领导与会。大家认为：

——“这是一部关于深圳历史文化、关于改革开放30年的全景式、权威性的优秀读本。”（王京生）

——“《深圳九章》通过审视深圳历史发展，站在深圳市未来创新发展的思路，以全球化为背景，以深圳文化为主脉，以当代性和现代化为动因，以求得历史、现实与未来的文化连接为最终目的，从历史、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生活等各个层面，全方位地解读深圳发展的轨迹和文明状态，对深圳的形象、品格和精神进行阐述和概括，极具深度和广度阐述了深圳文化和文化深圳。”（黄尚立）

——“用‘九章’这种形式也是黄树森的治学精神新的结晶、新的体现。这本书编写的方法确实是一种创造，他给我们提供了一种阅读一个城市，乃至一个省份一种新的形式。它把严谨的学术性和生动活泼的形式紧密地结合起来，使得著作有很强的可读性。用独特的编辑方式，使文本具有极生动的、极丰富的表现形式。”（刘斯奋）

——“《深圳九章》是思想的阐述，具备思想性，但是它又不是全面地进行思想阐述，它又不是做严谨的学术研究，实际上它并不是完全以思想深刻和学术境界独特为见长，但是它有强烈的思想冲击力，我觉得这就是‘九章’最根本的特征，它是以思想来抒发情感的，它是伟大时代的思想抒情。它把思想要素转化为一种抒情的要素，我们就在阅读中获得一种淋漓尽致的快感和兴奋，让我们心潮澎湃，精神振奋，领略到这种思想和历史的震撼力、冲击力。”（贺绍俊）

.....

鉴于《深圳九章——开放史记 改革通鉴》篇幅有限，许多重要的文献史料，以及深层次的专题研究、卖力气的史传书写，只有俟于来日、俟于来者了，这其中就包括刘中国与青年记者余俊杰最近完成的《刘铸伯传》《刘铸伯文集》。近些年，我提出深圳打造联合国“文学之城”的建议，为书写者圆梦，期望特区内外、体制内外的写作者，“贻我彤管”，而非戈矛、绞索、板斧以及祖传十八代照样削铁如泥的杀猪刀。

“红荔山庄”与“无政府共产主义”实验基地

深圳历史演进过程中形成了许多“兴奋点”，无不被刘中国近二十年间出版的一系列著述一一捕捉、具体呈现：为了洪武二十七年开筑的大鹏千户所（在大鹏半岛），他写出了史论专著《大鹏所城：深港六百年》，几年后深圳有了一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；为了孙中山策划的三洲田庚子首义（今属盐田区），他完成了《打响世纪第一枪》；为了纪念巴色会来深圳传教160年，他推出了五卷本的“李朗圣山丛书”；为了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，他与青年记者余俊杰等联手推出了多卷本的“白石龙大营救书系”（前五卷已经出版）。此外，刘中国还在深圳市档案馆的支持下整理出版了12卷本的深圳档案文献演绎，这套书上迄明清两朝，下至改革开放初期。早在2000年，深圳市领导为他担纲完成的《明清两朝深圳档案文献演绎》作序，认为该书“系统全面地描摹了明清时期深港地区的历史和文化驱动力，从而为深圳的昨天与今天架起了一座横亘不断的桥梁，为深港地区的历史发展和文化交融提供了崭新的坐标，这对于日益加强的深港合作，对于深港地区携手共创辉煌，提供了无可辩驳的史实依据”。

2015年底，我应邀出席“白石龙大营救书系”座谈会，深圳市史志办主任黄玲女士和深圳市博物馆原馆长杨耀林先生等，对刘中国的治学精神与他出版的一系列著述予以高度评价；我则认为“白石龙大营救书系”的出版，是深圳的一个重要“文化事件”。800名中国文化精英云集一地，任何时候都是一个“大事件”！更何况被营救的文化精英，新中国成立后大部分人又重新步入深圳。但是，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始，这些被刘中国表述为“被抢救的圣火”，陆陆续续熄灭，“文革”期间更是全军覆没，灰飞烟灭。坐了25年牢的胡风当年在白石龙扔烟头差点烧了游击队的草寮，《胡风回忆录》还记录他在白石龙一毫子买了两只生蚝的细节。胡风反革命集团案2100人被牵连，92人被捕，62人隔离审查，成为中国文化一大污染的水源，造成其后千奇百怪的众多水源，最

绀弩有诗云：“无端狂笑无端哭，三十万言三十年。”

这一回，两位作者在《刘铸伯传》的“引子”与第六章里，轻描淡写地点出“红荔山庄”这个地名。这就让我啧啧称奇！“红荔山庄”是中国无政府主义宗师刘师复1912年发起创建的一处“中国无政府共产主义”试验基地，据文定《师复先生传》记载：“先生又以为都市太繁扰，想约同志到乡村居住，半耕半读，曾在新安的赤湾觅得一地，从香港航行约两小时可到，面临零丁洋，右傍宋帝陵，有田七十亩，荔枝五百株”——这就是“红荔山庄”的由来。对于刘师复等人提倡的“中国无政府共产主义”理论，刘铸伯在《社会主义平议》一书中一一予以驳斥。事实上，刘师复约集同志在“红荔山庄”建立无政府共产主义试验地的一番努力，结果也是以失败告终。

刘师复创建的“中国无政府共产主义”试验基地“红荔山庄”早被人漠忘，刘铸伯、谭汝俭抨击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作《社会主义平议》绝版将近百年。但是，历史的发展过程从来都有意想不到的巧合与吊诡，譬如，中国改革开放的“开山炮”，偏偏是从密邻“红荔山庄”的蛇口响起的。而在1981年11月20日，刘铸伯长孙刘镇国（香港油麻地小轮公司总裁）、曾孙刘定中（香港油麻地小轮公司总经理）旗下的飞翔船，从九龙大角嘴码头首航蛇口。从此，停航三十多年的香港——蛇口航线得以恢复。

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这种意想不到的“巧合”与“吊诡”，还在继续发生：无政府共产主义试验基地“红荔山庄”，今属中国·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管辖。刘中国告诉我，去年深圳市前海管理局与龙岗区政府签署“深化区域合作框架协议”，其中包括：将龙岗区平湖金融与现代服务业基地、平湖西部工业园区，打造为“前海后陆（平湖）拓展区”。这么一来，就像他说的，如今刘铸伯故里平湖，又与“红荔山庄”旧址所在地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搭上了一层关系。

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在《人类理智新论》一书中写道：“现在怀着未来的胚胎，压着过去的负担。”钱钟书先生《读〈拉奥孔〉》一文引述这个经典名句时发挥道：“抽象地说，时间的每一片刻无不背上负重而腹中怀孕。在具体人生经验里，各个片刻有不同的价值和意义；负担或轻或重，或则求卸却而不能，或则欲放下而不忍，胚胎有的尚未成熟，有的即可产生，有的恰如期望，有的大出意料。”“用胡塞尔现象学的术语来说，‘内心的时间意识’的每一刻都是‘留存’过去和‘延伸’未来的辩证状态。”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：刘师复“中国无政府共产主义”试验基地“红荔山庄”，不仅与北伐前夜的蒋介石发生了关系，并且与中国改革开放的“试管”、对外开放的“窗口”重叠在一起，而今刘铸伯故里又成了“前海后陆（平湖）拓展区”，这就不免令人拍案叫绝。深圳文史学者、企业家不妨仔细考证筹划一番，早日恢复“红荔山庄”旧貌，这比再捋飭几个“人造景点”更具有人文意义。

一位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“失踪者”

大师巨擘，到后来也无不为时间“结构”，留下残简断篇、片语只言，这就像铜雀台坍塌后瓦当还可以磨成砚台。刘铸伯也是一位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“失踪者”，迄今出版的任何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、文化史专著，我们找不到他的名字。但是，刘中国、余俊杰在撰写《刘铸伯传》之余，整理的这部《刘铸伯文集》得以出版，使得刘铸伯在中国近代思想史、文化史上的地位从此无法撼动。

我很佩服两位作者“上穷碧落下黄泉”挖掘原始文献的劲头儿，最感兴趣的是，刘铸伯的《社会主义平议》失传将近百年，这次也给他们打捞出来，仔细整理编入《刘铸伯文集》。无论对于研究民国初年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学者来说，还是对于研究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历史的学者来说，这部著作都不失其珍贵的文献学价值。

刘铸伯的《社会主义平议》得以重见天日，这也是深圳文化史、思想史、学术史研究领域的一项重大发现。

在《刘铸伯传》一书中，两位作者对刘铸伯的《社会主义平议》进行了详细解读，其中写道：

“恺撒的归恺撒，上帝的归上帝”——《圣经》中有处记载耶稣曾提到恺撒，耶稣说出这条原则，是要回答犹太人应否缴纳“人头税”给罗马政府这个问题。

“恺撒”一词，指的是政府或国家。既然刘铸伯、谭汝俭所著《社会主义平议》一书，在考察欧洲无政府主义起源时，上溯到“希腊古代之哲学家，如柏拉图，及亚里士多德，已倡‘共产’之说，而基督教亦含有此种意义……”那么，我们是否可以说：20世纪初的以“师复主义”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，同样包孕着科学社会主义的萌芽，科学社会主义里，也一样孕育着无政府主义的萌芽（可以“文革”为例）？或者正如钱钟书先生《一节历史掌故、一个宗教寓言、一篇小说》所言：

“即使在满纸荒唐言的神怪故事里，真实事物感也是很需要的成分；‘虚幻的花园里有真实的癞蛤蟆’（imaginary gardens with real toads in them），虚幻的癞蛤蟆处在真实的花园里，相反相成，才添趣味。绝对唯心论也得假设客体的‘非我’，使主体的‘我’遭遇抗拒（Anstoss）而激发创造力，也得承认客观‘必然性’，使主动性‘自由’具有意义和价值。这是同样的道理。”

这段文字看似几句“闲笔”，实则是一番快当之论。括号里的“可以‘文革’为例”六个字，传导了一个绵远的信息——刘铸伯批判以“师复主义”为代表的“无政府共产主义”时已经指出：“彼见为社会之不良，经济之不均，无日不挟其偏陂之学说，以相为鼓煽，势必为子者归而革其父，为弟者归而革其兄，为妇者归而革其夫，为卑幼者归而革其尊长，为学生者归而革其校长，为庸役者归而革其厂主，为火伴者归而革其肆主，以力求其社会之良与经济之均，顾吾恐社会未良，经济未均，而斯民已无噍类矣。”为此，提出了消弭无政府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种种办法。

《圣经》有言：“先知在自己家乡从来不受欢迎。”而且，先知的声音从来都是低

微的，时常被时代暴风雨的喧嚣声遮蔽、压倒。经历过“反右”“文革”“清污”等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的我辈，直到耄耋之年才读到《社会主义平议》这部“奇书”，十分痛切地感到：刘铸伯描绘的“为子者归而革其父，为弟者归而革其兄，为妇者归而革其夫，为卑幼者归而革其尊长，为学生者归而革其校长，为庸役者归而革其厂主，为火伴者归而革其肆主”状况，何尝不是对“文革”时期社会乱象的一种预言？刘铸伯预言了“十年动乱”这一乱象，开出了几剂“药方”，却无法予以阻止。这不是预言家的过错。我们经历了罄竹难书的“十年浩劫”，却没有对中国历史上创痛巨深的“文化浩劫”进行彻底的反思，“文革”一结束就“团结一致向前看”。领导人说：“关于‘文化大革命’，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，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，这对统一全党的认识，是需要的”“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，总要总结，但是不必匆忙去做”；尽管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否定了“文革”，但是近些年为“文革”招魂者还大有人在。这是一个民族的悲哀。

香港“南风窗”与宝安“后花园”

我作序的《容闳传》（刘中国、黄晓东合著）出版于2003年，新书首发式与研讨会召开当天，珠海市宣布将容闳博士昔年捐建的“甄贤社学”辟为“容闳纪念馆”“中国留学生博物馆”。到会者中西嘉宾（包括容闳后人、留美幼童后裔）500余人，我与中山大学黄天骢、易新农、叶春生教授以及刘中国的同窗好友辛磊、陈美华夫妇等欣然与会。

《容闳传》出版后反响极大。次年，珠海召开了“留美幼童后裔座谈会”，珠海市与美国的哈特福特市结为“姊妹城市”，耶鲁大学竖起了容闳的雕塑。有次开会，刘中国奉呈深圳老领导李灏学长一册《容闳传》。不久，李灏约谈，说是读后思考了许多问题，既然容闳的出现与珠海毗邻澳门不无关系，那么深圳毗邻香港，是否也出现过容闳那样有影响的本土人物？

刘中国当天晚上给我电话，很是激动。三五年后，他出版了《深圳：李朗存真书院》《深圳：布吉凌家》《凌道扬传》《没有勋章的凯旋——外科医生凌宏琛传》等史传作品，算是交上一份“答卷”吧！人们这时才恍然大悟：1857年巴色会传入深圳后，曾经在布吉的李朗建立一所大学，该校毕业生的后人凌道扬后来发起创建香港中文大学，他的堂兄弟凌宪扬则是上海沪江大学末任校长，等等。

李朗存真书院（又称“李朗神科大学”）是中西文化交流与传播之重镇。《深圳：李朗存真书院》出版不久，书院遗址就被推平了，建了一所传染病医院。这是一件颇可玩味的事情。

刘铸伯之所以成为刘铸伯，同样受“南风窗”香港的影响。1916年12月31日，刘铸伯主持平湖纪幼劳学校、念妇贤医院开幕典礼，省港大佬数百人参加盛典，其中就有广东省省长朱庆澜。两位作者找到了百年前旧报纸上刊登的《平湖医院学校开幕纪事》，

该文录有朱庆澜的演讲词：“我国民族最富有进取心，亦最富有爱国心。世人诋之以守旧，目之以散沙，此未免一孔之见，盖在专制时代，内地人民一切行动，皆当受政治之支配，故耳目有所钿蔽，能力亦无由发展，惟交通处所与外人相接近者，则类能吸取世界文明以发扬其特性……”

快哉斯言朱省长！这位行伍出身的民初要人，砍砍杀杀接地气，而且快人快语，几句就说透了中华民族“守旧论”“散沙论”祸根之所在，认为形成这种“病灶”的根本原因在于“专制”。试想想：明代钦令“片板不许入海”，沿海地区“闹倭寇”，一直闹到朱明王朝崩了盘；清初下达“迁海令”，沿海地区“山贼海寇”啸聚揭竿者枚不胜数；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“文革”期间封锁深港边界，逃港者铤而走险、络绎不绝；而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间，终于出现了“万邦来朝”从事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交流的盛况！

朱庆澜当日指出：“惟交通处所与外人相接近者，则类能吸取世界文明以发扬其特性，于团体则务为结合，相与谋公共之治安，与国家则务为协助以为之后盾，不特其所营之各工商事业，足与世界相颉颃已也，盖于世界竞争之理，人类生存之故，知之较真，故行之尤力。”刘铸伯实乃19世纪末、20世纪初冲破钿蔽、觅求新知的深圳本土代表人物之一。诚如朱庆澜所言：“刘君铸伯，经商于香港数十年，洞悉中外情形，于我国文明力图进步，为当时开风气，为人类造幸福，生平于振兴商业外，如兴学校、设医院、救灾济贫等事，罔不惨淡经营，踊跃从事，其进取之勇敢，固令人惊叹，而爱国之热忱，尤人所难及……”

去年7月，孙女子萱归国过暑假，给我放了一曲无名歌手演唱的《闯码头》：“我们一起闯码头/马上和你要分手/催人的汽笛淹没了哀愁/止不住的眼泪流……”今天重听一遍，感到“码头”二字，衍生出一系列纷繁的意象。以本书披露的刘铸伯及其中央书院同窗、中西生意伙伴的经历来看，无一不在“闯码头”。闯下了“码头”，也就是有了自己的地盘、事业，但你不可能占地为王，拒绝别人来“闯码头”。于是，20世纪初期，香港“劳动家”与“资本家”发生了一一次次冲突，最突出的两例是海员大罢工、省港大罢工。海员大罢工的领袖是宝安南头人陈炳根，省港大罢工领袖人物之一的陈郁，同样是宝安南头人。而在海员大罢工期间，刘铸伯、周寿臣等曾以宝安同乡的名义出面“调停”。与刘铸伯一样，他的晚辈同乡陈炳根、陈郁也是在香港这个“大码头”接受了新思想、新观念。

“耳目有所钿蔽”时代的信息发散地，也许就是一口井壁上长满青苔的老井，南宋叶梦得在《避暑录话》所谓“凡有井水处，皆能歌柳词”者是也。更多的信息传播源则在学堂、市井、车站与码头。刘铸伯等在香港“大码头”上接受西洋教育，他和何东、周寿臣、何泽生（何福）等中央书院早期毕业生在文化取向方面偏于“守旧”，香港礼贤会王爱棠牧师、杨少泉医生以及麦梅生等基督教人士则偏重于“革新”，双方1921年至1922年就香港婢女制度废存问题展开大讨论，极力主张废除婢制的王爱棠牧师甚至公开撰文抨击刘铸伯“在上则傀儡国家之议员，在下则傀儡侨港之黎庶（小民）”。此事一直闹到英国众议院，最后由国务大臣丘吉尔出面才摆平。

这里拈出书中如上数例，想借此说明：互联网时代在尊重并相信自身文化实力的基础上，要包容和借鉴外来文化先进的部分。毕竟，“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”的“独角戏”早已收场，孙中山“世界潮流，浩浩荡荡；顺之则昌，逆之则亡”这几句话，倒是颇值玩味。

至今记得20世纪60年代初，陶铸提出“香港是宝安的城市，宝安是香港的后花园”（原话是：“香港和宝安是城乡关系，香港是宝安的城市，宝安是香港的郊区。在深圳要建立游览区，让香港人到深圳游览。”），要充分利用好香港建设宝安县。1961年深圳戏院建成，成为全国第一家有空调、音响等先进设备的戏院。全国著名的京剧、越剧、豫剧团都来过深圳戏院演出，包括谢贤（谢霆锋之父）在内的许多港澳同胞前来观看。李富林后来写回忆录时透露，当时周恩来对宝安、深圳非常重视，曾经说：“深圳是国家的窗口”，使他们受到很大鼓舞。但在“文革”期间，陶铸、赵紫阳等广东领导人因此被戴上了“卖国贼”的帽子。现如今“卖国贼”与“爱国贼”们又在网络上大开“口水战”，去年竟有人厉声吆喝：“别让李嘉诚跑了！”

“站好队”与“站错边”

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不久，林雨纯到广州找我说：“《深圳特区报》拟试刊，想请个名家题写报名，张洪斌的意思是最好请秦粤生先生题写，你给想想办法吧。”我陪他到文德路75号广东作家协会对面马路一条小巷找到秦粤生家，秦先生听罢，欣然命笔，接连写了几幅，都不甚满意，有幅字还写错了，揉成一团扔在地上。《深圳特区报》“报头”的润笔费，是林雨纯带去的一小盒进口巧克力。

尔等小事，本不值一提。但是现如今讲谈“历史真相”的，就像太监谈性生活如何美好般样，又像有学者调侃的如横店里杀的鬼子都是戏剧性的。果不其然，这段所谓“难忘的记忆”“峥嵘的往事”，后来被人敷衍成了一段莫名其妙的文字：“筹备试刊时，刚好遇上广东省著名书法家秦粤生来深圳，市领导就请他为特区报题报头。”相比之下，老友曾锦棠的回忆文字更接近事实，他说：“我和张洪斌还就《深圳特区报》的报头请谁书写的问题，商量过几次。几经考虑，最后决定请广东的著名书法家秦粤生先生书写。他写了龔宝子体及行书这两种字体，每种字体都各书写了两份，《深圳特区报》试刊第一期是采用龔宝子体，但有部分读者反映，这种字体有许多人看不习惯。于是，从《深圳特区报》试刊第二期开始，报头便改为秦老书写的行书，一直沿用至今。”曾锦棠当时是市委新闻秘书，时任新华社内参记者的张洪斌也是我的老朋友，林雨纯当时则是特区报财贸组记者，如今都“失联”好多年了，正庄周所谓“相啻以湿，相濡以沫，不如相忘于江湖。与其誉尧而非桀也，不如两忘而化其道”。

重提陈年旧事，还有感于人们回忆往事时思维的混乱与记忆的缺失。其实，推动中央做出改革开放大政方针的是“逃港潮”，是亿万百姓饿扁的肚皮。民声乃天声，最高决策者顺应了民声，历史的车轮这才从泥潭里拔出来，开上坦途。明明是饥饿岁月无情

凌迟，哪里像“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”，唱得那样轻飘飘、甜腻腻？我们要回归“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”这个常识。再比如，不少人根据平湖父老“刘铸伯是东莞何氏遗腹子”的口头传说，敷衍出一篇篇“励志体”好文章，本书两位作者则根据《先考铸伯刘公府君行述》与香港历史档案馆的文献史料，订正了这一讹误。史传文字的写作，需要探赜索隐，钩深致远，容不得丝毫的道听途说、人云亦云。这是常识，也是底线。

综观这两部著作，有许多令人大开眼界之处。毫无疑问，《社会主义平议》的发现与整理出版，奠定了刘铸伯在中国近代思想史、文化史上的地位。但是，两位作者丝毫没有回避，刘铸伯作为屈臣氏大药房总买办，在大力推销拳头产品“戒烟精粉”（李鸿章、刘坤一、沈葆楨等封疆大吏纷纷应邀题匾褒扬，甚或捐养廉银购买该药品馈赠瘾君子）的同时，他还与何东、何福（澳门赌王何鸿燊的祖父）、何甘棠、梁仁甫、吴理卿、陈启明等买办出身的慈善家从事过鸦片专卖。他们都是中央书院的早期毕业生，后来均成为香港的特许鸦片经营商，而且“在鸦片经营方面拥有丰富知识”。这就深刻揭示了“买办”人格的二重性：一方面他们博涉西籍、阅中肆外，成为中西方文化交往的津梁式人物；另一方面作为买办商人，他们在生意场上追求利益的最大化、合法化。

“买办”身上的这种双重人格，滋生出一种“原罪感”与自我救赎的努力，他们在囤积起了大量金钱的同时，无一例外地热衷于公益事业，抚恤孤寡，赈济贫民与灾民，这就不难理解他们为何有了“慈善家”的头衔。这种“人格二重性”在中国现代文化人身上也有突出表现，甚至是精彩的“表演”。他们在“反胡风”“反右”时期，不是有过精彩“表演”吗？最后，“文革”爆发，一网打尽。此处按下不表。

刘铸伯作为20世纪初叶的香港华人领袖人物，时常被卷入故国与“番邦”、香港与内地、新潮与传统、“劳动家”与“资本家”冲突的夹缝之中。他敢于以议员身份叫板香港政府，要求取消香港华人“检疫”苛例；敢于约集华商公局同人，宴请下野后莅临香港的孙中山；他在讨论婢制废存大会上说：“自有定例局以来，华人议员，因政府立例，而在公众之地开大叙会者，此实为创举也，盖在三十年前，中国人对于公众事业，尚少注意，今则与前不同，盖今日程度已大增进，良堪贺喜矣。但自此次以后，如英国行何种则例，我两华人议员不力争，诸君尚敢骂我溺职否？”他主动出面调停包括香港海员大罢工在内的一系列劳资纠纷，等等，所有这些都存在一个“站好队”“站错边”的问题。这在书中均有详略不一的解读，容我不再一一评点。

“天下大事，必作于细”

近二十余年来，我对区域文化研究发生了极浓厚的兴趣，主编出版了“中国九章”书系，深感任何一个区域都具有各自特色鲜明的人文传统，蕴藏着深厚的人文资源，始终拥有大致清晰的人文疆界。通过《深圳九章——开放史记 改革通鉴》的编撰，我们试图从区域的角度，研究社会历史文化生活现象，不仅把各个区域人文系统当作整体的

产物来进行研究，而且还要探索其内在结构、各种对象及其特有的社会文化现象的空间轮廓，系统内部的“运动曲线”和外部联系，区域文化系统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扬弃、利用、改造的人文资源和社会条件，以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保护利用、发展创新人文资源所应该采取的措施，力图描绘出一幅面向现代化、面向全球化、面向未来的深圳人文地图。

恩格斯在《自然辩证法·导言》中盛赞欧洲文艺复兴“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、进步的变革，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——在思维能力和热情和性格方面，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”。鸦片战争失败后，先进的封疆大吏与知识分子发起“自强”运动（洋务运动）、戊戌变法，应对列强的侵袭。所谓“自强”“变法”运动，何尝不是发“民族复兴”之先声？也就是在这样一个漫长的“过渡时代”里，刘铸伯得以脱颖而出，“为当时开风气，为人类造幸福”，成为一位清末民初卓越人物、一个被时贤称道的“伟大的爱国者”。20世纪末，老是听人议论深圳是“文化沙漠”，没有大师巨擘。事实证明，深圳有自己丰腴的“文化水土”，从来不是一块莫名其妙的所谓“文化飞地”，并且近代以来也涌现出了包括刘铸伯在内的大批杰出人物，问题是如何保护本土文化资源，擦亮本土历史人物品牌。

就平湖一地而论，不妨借助凤凰山国家矿山公园建设与这两本著作的出版，进一步梳理文脉，盘活文化资源，拓展区域文化系统内部“运动”和外部“运动”的双曲线，在保护好纪幼劳学校、念妇贤医院，修葺青奇坑刘铸伯家族墓地、享堂的同时，创建“刘铸伯纪念馆”。还可以在此基础上拍摄历史纪录片、电影、电视连续剧，全方位、多角度向世人展示平湖乡贤刘铸伯的形象，增强平湖区域文化的亲和力、感召力和凝聚力，创造人文关怀的福祉。

本书作者说，1996年有个去平湖工作的机会，因为交通不便而放弃了。他那次在凤凰山青奇坑捡了块陶片。我的同窗密友、中山大学金钦俊教授，今春在自己的这位弟子家小住，修订文集《记忆树上的杂花》，审阅《刘铸伯传》《刘铸伯文集》这两部书稿，见到了这块放在书架上的粗陶片，建议设计封面时放在两书的封底。我看也好。一本传记的撰写，一部文集的编订，何尝不是将散落各地的碎陶片，复原为圆润如初的陶器？这番“复原”工作大不易，刘中国前后下了多年工夫，也得到了他的师友、文友的支持，尤其是昔年“龙城文学社”发起人何小培、黄惠波、赖房千、魏琦、温波、陈少鹏诸君的支持。我与刘斯奋、陈俊年、章以武、韦丘等是“龙城文学社”顾问，“龙城文学社”后来变成了“文联”，我很欣慰地看到，“文学社”创社成员迄今仍然笔耕不辍，互相砥砺，“愿是月光下的歌者，不愿做殿堂里的诗人”，永葆初心，脚踏实地，拒绝合唱，时有作品问世。这是很可贵的。

这两部书稿很厚实，我读得十分沉重，拉拉杂杂写了这么多。还是回到当年“茅洲河挖淤泥”这个话题吧！四十年来，深圳创作者一铲铲挖出河底的淤泥，一锤锤捣碎骇人的暗礁，让一条条河流肆意地流淌，让江河湖海上漂满南来北往的帆影，这是颇值得令人欣慰的。

《道德经》说：“天下难事，必作于易；天下大事，必作于细”；西洋人也讲过“上帝存在于细节之中”这样的话。姑且录此数句，与本书作者以及久违的“龙城文学社”诸君共勉！

是为序。

2016年2月初稿

2016年4月定稿

作者简介

黄树森，文学评论家。1935年出生于武汉，1959年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，中国文联第六、第七届代表，历任《作品》编辑组长、编委，《现代人报》副总编辑，中国第一家文学评论月刊《当代文坛报》副主编、主编、编审。出版专著和编著有《题材纵横谈》《手记·叩问——经济文化时代猜想之子丑寅卯》《春天纪》《广东九章》《上海九章》《广西九章》《深圳九章》等，主编“叩问岭南”丛书五种、“流行蛊”丛书六种、“地道广东”六种；近年有《黄说》《说黄》等著作问世。现任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名誉主席、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、中山大学兼职教授、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。

序 二

黄惠波

“城市细节”构成了一座城市的经络、血脉和细胞。一座充满“细节”的城市予人以自信、力量与想象的空间。中国的改革开放开启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，一个古老的民族开始走上复兴之路。但也毋庸讳言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高歌猛进、摧枯拉朽，“万丈高楼平地起”，城市的“细节”正从千篇一律的建筑群里逐渐退隐乃至消亡，城市记忆也日益变得模糊不清。

就深圳这座城市而言，既不缺乏自己鲜活的“城市细节”、绵长的“城市记忆”，也不缺乏自己的“高大上”人物。但是，人们更多瞩目的是它在改革开放数十年间演绎的宏大叙事，罕有人知的是，深圳平湖乡贤刘铸伯19世纪末、20世纪初曾经叱咤香江，对香港与内地的政治、经济、外交、文化、教育、医疗卫生与慈善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；而在1978年11月，他的长孙刘镇国（时任油麻地小轮公司总裁）、曾孙刘定中（时任油麻地小轮公司总经理）在吹响改革开放集结号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，已经开通了香港——广州之间中断近三十年的直通船，堪称改革开放前夕飞进内地的第一只春燕。

任何一个地方的乡邦先贤、文化遗产，都承载着族群的集体记忆与强烈的认同感、自豪感，彰显着历史文化根脉之所在、魂魄之所系。有感于“城市细节”的缺失、“城市记忆”的模糊，我们邀请深圳文史学者刘中国先生、深圳报业集团记者余俊杰先生完成了《刘铸伯传》，编撰了《刘铸伯文集》，向世人全方位展现刘铸伯这么一位学贯中西、视野开阔、民胞物与的本土人物，为深圳的“城市细节”增添经典故事，为“城市记忆”奏响华彩乐章，为深圳的“城市文脉”疏通经络。

曾经在香港中央书院求学的孙中山先生被人誉为“香港的珍珠”，他的学长、平湖乡贤刘铸伯亦然。我曾经在《维多利亚港》一诗中写道：“一滴水/如一颗泪/苦涩 辛酸/如一朝露/甘甜 清爽/千万滴水/汇聚成沧桑维港/坦荡 辉煌/这就是百年香江。”刘铸伯生长于香港，少年时就读于大华民义学、西营盘冯富义学，1885年毕业于香港大书院

(今皇仁书院), 历任香港天文台译员、台湾淡水西学堂总教习兼洋务委员、屈臣氏大药房总买办。在清末西学东渐时代大背景之下, 他勇于接受西学, 珍爱传统文化, 成为中西方文化交汇时代一位桥梁式的人物, 于兴革损益, 多所主张, 中西人士咸倚重之。

20世纪初叶, 刘铸伯跻身香港华人领袖人物之列, 先后出任东华医院总理、主席, 华商公局及香港华商总会(今香港中华总商会)主席, 广华医院倡建总理, 香港政府定例局(立法局)议员、洁净局(市政局)议员、保良局局员等要职, 为香港华人谋利益, 关爱鳏寡妇幼弱势群体, 团结华商与西商展开商战; 他担任洁净局议员期间, “凡局例之不便者, 必据理辩争; 争之不获则奋髯抵几, 未尝少屈, 务得当乃已, 故华侨之阴受其赐者, 蹟不胜举”。担任定例局议员八年间, “为华侨谋者, 益复奋厉, 遇事靡所阿附, 崭然以风骨自见, 一如其在清静局时”“在局同人, 皆仰之如泰山北斗”。

刘铸伯12岁丧父, 家无隔夜之粮, 全靠寡母节衣缩食供其读书, 才有了后来的成就。面对世纪之交, 列强环视, 国力式微, 香港与内地失学儿童众多的现状, 刘铸伯多次感叹: “今海禁大开, 梯山航海, 华洋杂处, 中外通商, 非尽吾民皆读中国之书以养其体, 兼涉西国之学以广其用, 何以人人能明道理、增见识、通语言、善交接, 内以图一身之事业, 外以彰一国之文明哉?” “处此生活程度日高之时代, 以智识不开之贫民, 夫将何以自立”? 为此, 他于1901年与犹太富商嘉道理爵士发起创建育才书社, 担任司理一职, 募集善款办学, 得到了两广总督陶模等官绅的大力支持, 陆续在香港、广州、上海创办了三所育才学校, 免费招收贫家子弟就学, 培养出了包括中共一大代表陈公博、中国基督教著名思想家和活动家吴耀宗在内的大批人才。1908年, 刘铸伯有感于“外人诋吾华为无教国”, 发起创建孔圣会并任会长, 孔圣会的宗旨包括“振兴孔圣之德行道艺, 以期正人心, 立风化; 建立庙堂, 以纪念孔圣之功德; 倡设讲堂学校, 俾得广传圣道及振兴教育”等, 陆续在香港、广州、香山县(今中山市)、新安县(今深圳市)创办了30余所孔圣会义学, 施惠学子。其中一所, 就设在今天的平湖纪幼劳学校旧址。

故国故家, 念念可亲。刘铸伯具有一腔浓厚的家国情怀, 十分关心家乡平湖, 诸如创设平湖火车站, 规划建设平湖新圩, 创建纪幼劳学校与念妇贤医院, 创设工厂解决乡亲就业问题, 等等, 可谓众口皆碑, 平湖父老感念至今, 正如刘富宗(刘德谱)等《先考铸伯刘公府君行述》所言: “平湖者, 先人之庐墓在焉。先考既为国人谋, 尤笃爱其乡。广九铁路方建设时, 先考请于省吏, 将原定路轨改近平湖, 并于其地设车站, 乡人称便, 而路亦不迂。乡农贫苦, 时以子妇质钱, 而困于重息, 子女多没为奴婢, 先考悯之, 乃创设昌裕公司, 储蓄出贷, 取息甚微, 农人贤称颂不置。吾国无市政, 先考乃请于省吏, 小试于其乡, 创市场, 设学校, 立工厂, 建医院, 附以农林实业, 规模粗具, 于时人所称模范村者, 庶几近之, 其施于乡有如此者。”

刘铸伯施医兴学、救助孤寡、赈济香港与内地灾民的义举, 得到清朝政府、民国政府、英国政府的褒扬。1909年地处直隶的永定河泛滥成灾, 殃及京津地区, 史称“顺直水灾”, 刘铸伯发动香港华商赈捐出力, 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杨士骧奏保以道员候选加

盐运司銜（三品），赏换花翎。鼎革之后，以有功民国，奖给刘铸伯四等嘉禾章，寻晋给二等大绲嘉禾章、二等宝光嘉禾章；以襄募内国公债，大总统传令嘉奖，奖给刘铸伯“乐善好施”“急公好义”等匾额；以襄办香港事务迭著劳绩，英廷传谕嘉奖，并奖给刘铸伯二等宝星。

1916年12月31日，刘铸伯捐建的平湖纪勋劳学校、念妇贤医院举行开幕典礼，前来参加典礼的中西嘉宾，均为民国初年省港两地卓有声誉的人物。据1917年1月3日《香港华字日报》刊登的《平湖医院学校开幕纪事》记载：“省中政界大员，港中中西巨子，到会者济济有众。上午十点半钟，朱（庆澜）省长乘花车而至，同时有政务厅长罗树森、督军代表胡清瑞、教育科长吴在民，及统领魏邦屏、袁带等百余人。本港则有新界理民府罗士，大绅何东及夫人，及华商总会、东华医院各同人等共有二百余人之多。……各政界人员，均有演讲，尤以朱省长为娓娓动听。”朱庆澜在演讲中说：“刘君铸伯，经商于香港数十年，洞悉中外情形，于我国文明力图进步，为当时开风气，为人类造幸福，生平于振兴商业外，如兴学校、设医院、救灾济贫等事，罔不惨淡经营，踊跃从事，其进取之勇敢，固令人惊叹，而爱国之热忱，尤人所难及。”这是时贤对他的评价。

此外，刘铸伯为创建香港大学募捐70万元，担任香港大学校董会(Court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)董事、香港大学校务委员会(council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)委员职务；多次以香港华商领袖身份领衔募集资金，赈济内地灾荒；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；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，“吾国参焉，先考（刘铸伯）援国民外交之义，协大有银号，赠联军以飞机一乘，己则赠以红十字摩托车一辆，而中英邦交益加亲睦，论者咸以为识大体云”（《先考铸伯刘公府君行述》）；参与调停解决包括香港海员大罢工在内的劳资纠纷，等等。所有这些，两位作者在广泛收集占有历史档案文献的基础上，在这部洋洋60余万言的传记中均有翔实、准确而又客观的解读与描述，令人从中获得有益的启迪，从而不断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。

尤为难能可贵的是，两位作者从清末民国浩如烟海的报纸杂志里，仔细梳理查找刘铸伯的演讲、访谈、文告、信札，以及刘铸伯失传近百年的著述《自治须知》（1907年出版）、《社会主义平议》（1919年出版）等，编辑了一册厚重的《刘铸伯文集》。

刘铸伯的著作《社会主义平议》（与谭汝俭合著）是较早出现的一部抨击中国无政府主义的著述。谭汝俭在序言中交代了该书写作缘起：“民国初年，社会主义流入广州，余私心尝隐痛之。越丁巳（1917），避地香江，间涉译本，知各种主义，流布渐广，浸淫不已，终酿祸变，颇思着论辩之，顾卒卒未暇也。越己未（1919），应刘君铸伯之招，任《华商总会报》编辑撰述之役。……刘君幼通英文，博涉西籍，时刺取西国学者之说，相与往复讨论，于彼党谬义，多所辩正。余退而笔之于书，以付剞劂……”

谭汝俭所谓“民国初年，社会主义流入广州”，指的是1912年5月，中国无政府主义代表性人物刘师复（1884—1915）在广州组织“晦鸣学社”（晦鸣学舍），该社“是为中国内地传播无政府主义之第一团体”，其宗旨有八项：“共产主义；反对军国主义；工